

揭秘雍正帝的大毛病：偽造歷史 塗改檔案史料

本文摘自《新華文摘》1999年第06期，作者：秦暉，原題：《雍正王朝》是歷史正劇嗎？

我並不認同「文革」對「帝王將相文藝」的「左」傾討伐，但如果「帝王戲」越過了多元化的合理背景而畸形「繁榮」，恐怕也不正常。

今非昔比。但有趣的是從80年代起，史學界與文藝界都一反民國以來對「滿清」的貶斥，競相掀起歌頌清代帝王的浪潮。從努爾哈齊、皇太極、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以至多爾袞、孝莊文皇后，個個雄才大略，人人奮發有為，聖明君主之多開歷朝未有之盛。這種全盤否定遠古傳統與極其美化近古帝王的二潮並存現象很耐人尋味。90年代後，「大清頌」的調子更越唱越高了，以至出現「滿台大辮子」、「五個乾隆(或七個慈禧等等)鬧熒屏」的景觀。這裡除了市場經濟中娛樂文藝自然繁榮的成份外，因迴避現實的遁世幽默式「說古」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源自港台的「戲說乾隆」式帝王劇在大陸出現了青勝於藍的流行，也就不難理解了。

但近來帝王劇出現了新景觀，這就是號稱「歷史正劇」的《雍正王朝》，它以大投資、高檔次、權威參與、「大片」派頭、輿論宣傳加上市場炒作，掀起了空前的「雍正熱」。面對這個滿口現代話語的有為之君大紅大紫，一些史學家乃至愛新覺羅後人紛紛作證說雍正的「政績與人品」的確偉大，該劇從「大的氛圍」、「歷史事件」直到「器物層面」的細節都很「真實」云云。倒是據說改編所自的小說原作者二月河委婉地表達了他對這個「高大全」的雍正難以認同，對電視劇「把雍正塑成無私無畏的、一點缺點也沒有的人」頗有微詞。

的確，電視劇中的雍正與二月河小說中的形象已判若兩人，而與歷史上的雍正更是相差萬里。應當說這部片子在藝術上還是比較精彩的，要求創作的作品完全真實而不虛構更無必要。問題在於該劇編導打著「歷史正劇」的旗號，否認是在「戲說」雍正。該劇也確實是按照極鮮明的價值取向來編排的，並非消閒性的「戲說」可比。然而該劇不僅遠離歷史的真實，而且這一遠離所體現的取向更屬落伍。從「戲說」乾隆到「歪說」雍正，標誌著近年來帝王劇景觀的一個新發展，而如果說這廝的「戲說」本無害，欺世的「歪說」就更無益了。予以辯正，誠屬必要。

雍正是不是無私的「道德皇帝」？

歷史上的雍正政績雖無劇中誇張的那樣顯赫，但應當說還是個有為之君。傳統史觀因其殘暴而抹殺其政績的確不公，近年來史學界在這一點上是幾成共識的。然而在專制的「家天下」，有為之君未必有德，本也不足奇。如唐太宗的殺兄誅弟、霸佔弟媳、逼父奪位，武則天的連殺親子乃至親手掐死自己的女兒，明成祖的叔奪侄位、株連「十族」，隋文帝的謀殺小外孫而篡其國，等等，就反映了絕對權力導致絕對之惡的規律和專制極權具有的「道德淘汰機制」。歷史上九重之內的宮廷陰謀、厚黑者勝，是不勝枚舉的。今天的歷史觀沒有必要把帝王的治國能力與其「得國之正」混為一談。過去人們以雍正「得國不正」而漠視其治國之績；如今的電視劇為張揚其治國之績而把他的「得國」說得高尚無比，其實都是基於同一種陳腐觀念。

當然更重要的不在於觀念而在於事實。與歷史上的其他「得國不正者」相比，雍正的特點在於他的「得國」不僅在後世常受譴責，而且在他在位時就有「流言」頂著嚴刑峻法而四處播散。

為了平息指責，雍正挖空心思寫了《大義覺迷錄》一書以自辯，我們今天看到的電視劇就是以這本奇書中的雍正自道為基礎而進一步拔高的。

根據這種說法，雍正本無心於大寶，只是目睹時艱，「為社稷百姓著想」，又受了父皇囑其改革除弊之重托，才勉承大任，做了這「有國無家」、嘗盡「人間萬苦」的社會公僕。而他的政敵則個個陰險惡毒，以私害國害民，大搞鬼魅之伎，與他不僅有「改革」和「保守」的線路鬥爭，而且有善與惡、光明正大與陰謀詭計的人品較量。他們不顧雍正的寬宏大量，怙惡不悛，死不悔改，不僅在雍正繼位前妄圖篡國，而且在整個雍正年間都猖狂作亂，從煽動社會風潮、策劃宮廷陰謀直到發動軍事政變，為破壞「新政」、謀害雍正而無所不用其極。而雍正正忍無可忍時才發動正義的反擊，但依然寬宏待敵，仁至義盡。通過雍正自己粗茶淡飯，卻給大逆犯會靜享用豐盛御膳、自己大義滅親殺愛子，卻對主要政敵「阿其那(狗)」不忍加誅等「感人場面」，電視劇向人們展示了一個「愛民第一、勤政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德天子之浩蕩皇恩！

這樣的歪說也未免太離譜了。封建時代的宮廷陰謀往往成爲千古之謎，說法衆多難以統一並不奇怪，可是在雍正問題上無論怎樣衆說紛紛，嚴肅的史學家沒有一個會相信《大義覺迷錄》中的雍正自道，包括那些高度評價雍正政績的人在內。因為該書的拙劣編造早在當時就已是欲蓋彌彰，以致雍正一死乾隆立即把它列爲禁書。正如我國一流清史專家集體編著的最近著作《清代簡史》(多卷本《清代全史》簡編本)所說：「由於胤*與隆科多合謀取得帝位，事出倉猝，密謀不周，以致漏洞很多。雍正即位後，花了很大氣力堵塞漏洞，但越堵越漏，《大義覺迷錄》就是其中一個典型。」對這樣一種連雍正的兒子和指定繼承人都羞於示人的編造，這部「歷史正劇」的編導卻不僅全盤接受，還錦上添花，真是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馮爾康先生是國內史學界倡導給雍正翻案的代標，會譽雍正爲「中國歷史上爲數不多的比較傑出的帝王之一」。但馮先生對雍正偽造歷史的劣行也深有體會。中國素有標榜直筆的「史官文化」，雖然實際上歷代帝王都干預修史，造成「實錄」不實，但像雍正那樣不僅偽造歷史，而且塗改檔案，偽造史料，則還是罕見的。在對照了雍正「加工」過的《朱批諭旨》、《上諭內閣》等檔案與故宮中倖存的原件後，馮先生也感歎曰：雍正「愛改史料，實是一個大毛病。」(馮著：《雍正傳》522頁)宮中檔案尚要改，何況《大義覺迷錄》這樣的宣傳品？而雍正所以有此種愛好當然不是閒得無聊，實在是他虧心事做得太多了。

就以雍正「得國」而言，雖然九重之內的許多細節已成千古之謎，民間種種流言也未必可信(如改康熙遺詔「傳位十四子」爲「傳位於四子」之說顯然不實)，但今天已能確證的事實是：第一，康熙暴卒於暢春園時，胤*與負責警衛的隆科多控制著局勢，真情如何只有他們二人清楚。而《大義覺迷錄》所講的「八人受誣」(即雍正到暢春園以前康熙已向隆科多及七位皇子下達了傳位詔諭)之說純屬編造。他爲何要編造呢？第二，所謂「康熙遺詔」的漢文原件仍

部丞相都有和平了結之意。而左宗棠手握重兵，駐紮西陲，可以作爲後援，因此，事情猶有可爲。經過一番艱難的鬥爭，繁複辯駁，終於於1881年重新簽訂了中俄《伊犁條約》，爭回了部分權益和領土。這是曾氏一生中最高光輝的一件事，爲其生前身後贏得了美好的聲名。

但是，在不久以後的中法戰爭和中法交涉中，曾紀澤的良苦用心就遭到了一次極爲痛心的打擊。作爲行走在外交第一線的使臣，他有責任和權利向政府申述自己對時局的設想，曾紀澤忠誠地履行自己的職責，他努力向最高決策者進獻忠言，希望能爲國家再爭得一線生機。本來，經過二十多年的洋務運動，中國的國力已經頗有些氣象，而法國經過普法戰爭的失敗之後，也並非人們想像的那樣強大，清政府完全可以統籌全局，周密部署，在疆場上與之一決高下，在談判桌上與之騰挪周旋。然而當時的清政府實在是太孱弱了，它既不能審時又昧於大勢，只是一味地妥協退讓，致使曾紀澤的真知灼見在中法交涉中沒有發揮積極的效用。交涉的不利結果和來自國內的訓示讓他懊惱，他深感自己的無力與無奈，思付年華漸逝，鬢髮已衰，他只能隨緣了。此時，陶彭澤閑靜、淡遠的人生態度自然令他心有憾焉了。

曾氏父子都感到世事無常、禍福難測——「人間隨處有乘除」，但他們生活的年代不同，人生遭際不一樣，具體的人生態度也稍有差異：曾國藩位尊權重，深忌「樓高易倒，樹高易折」，因此很超然——「萬事浮雲過太虛」；曾紀澤承襲父親勳名，有才，但不能見重於當道，而政府舉措失宜，中外交涉自是步履維艱，處此情境，「一腔憤血，寢難難安」，深歎「數年豪氣，一朝喪盡矣」，似有聽天由命的味道——「萬事乘除問酒家」。不同的人生態度影響了他們以後各自的行程：曾國藩謹小慎微，獲得善終，死後謚號「文正」，備極哀榮；曾紀澤的主張因與最高當局的決策相抵牾，先是被免掉出使法國大臣兼職，後又被召回國，在京城做著著不大不小的閒官，「不得當路之助」，頗不得意，鬱鬱以終。

曾氏父子都是中國傳統文化陶鑄出來的精英，在時代潮流的衝擊、影響下，他們具備了一些傳統士大夫所沒有的因素。曾國藩是洋務派的地方首領之一，曾紀澤似乎走得稍遠，他精通英語，目光新銳，持節外洋，在中外交涉中折衝樽俎，爲國家挽回了些許權利。但是，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仍充溢著傳統士大夫悲天憫人的情懷，他們仍屬於傳統的士人階層，只是時代的風雲變幻將他們推上了歷史的前台。在晚清詭譎的政局中，他們本能地將思維指向舊有的詩書典籍和他們心目中的名人賢士，在那裡尋找心靈的慰藉和精神的寄托，看來，也只能如此了。

史，以不能養母廢於世。渤恥之，不肯仕，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嘗以列禦寇拒粟……元和初，戶部侍郎李異、諫議大夫韋況文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昔屠羊說有言：『位三旌，祿萬鐘，知關於屠羊，然不可使吾君妄施。』彼賤賈也，猶能忘己愛君。臣雖欲盜榮以濟所欲，得無愧屠羊乎？」不拜。

至於曾紀澤詩中的陶彭澤就是陶淵明，東晉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市)人，因曾做過彭澤縣令，故有此稱謂。他不爲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常常爲人們津津樂道。他曾自況曰：「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忘懷得失。」他這種不隨流俗的心境和行爲在後世也深得嘉許。《宋書》說他「少有趣」。《舊唐書》讚頌他是「慢世逃名，放情肆志，逍遙泉石，無意於出處之間」。宋人洪邁在他的名作《容齋隨筆》裡更是稱譽他「高簡閑靜，爲晉、宋第一輩人」。

不論是深爲曾國藩推崇的屠羊說，還是曾紀澤心嚮往之的陶彭澤，他們的共同點就是不懷個人名位和際遇，這就使得那些自感人生不如意的人對其產生了心靈感應。

時至晚清，政象紛紜，生活於其中的人們常有朝不保夕之感。1864年的曾國藩達到他人生的最高峰，然而，所謂名既大，謗亦隨之。在他享有極大極高尊榮的時候，非議之音也紛至沓來，「左列鐘銘右謗書」。此情此景，他只有逃避和明哲保身，把一切都看淡看輕。

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染的曾國藩，又經過多年宦海沉浮的歷練，深知「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的道理，意識到「處茲亂世，凡高位、大名、重權，三者皆在憂危之中」，「禍咎之來，本難逆料」，「當於極盛之時，預作衰時設想；當盛時百事平順之際，預爲衰時百事拂逆地步」，「惟不貪財，不取巧，不沾名，不驕盈，四者究可彌縫一二」。這樣，才能「持盈保泰」。也難怪曾國藩對屠羊說如此崇拜了！這裡，曾國藩感佩和心儀的是屠羊說內心的超脫與寧靜。

曾紀澤(1839—1890年)，湖南湘鄉人，曾國藩之子。曾國藩死後，曾紀澤襲封「一等毅勇侯」，地位仍然十分尊榮。作爲當時爲數不多的熟悉世界政治的幹才，他被遴選去從事外交事務。1878—1886年間出使英、法、俄國。1879年因崇厚簽訂的《裡瓦基亞條約》喪權太甚，舉國嘩然，清政府迫於輿論，拒絕批准條約，並於1880年派遣出使英、法大臣曾紀澤兼充出使俄國大臣赴俄談判，力圖挽回損失。面對如此不利局面，曾紀澤不避艱辛，決心完成「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使命。他分析形勢，認爲俄國自攻克土耳其後，財力已大受損傷，且與英國等國有矛盾，不會再對中國發起一場戰爭，俄皇與其外

令曾國藩父子「低頭一拜」的人物是誰？

1864年，經過多年的征戰，曾國藩率領他的湘軍終於平定了太平天國，挽救了搖搖欲墜的大清王朝。對於清王朝的頂樑柱和救命恩人，清王朝並不吝惜賞賜，給了他極高的封賞，此時的曾國藩榮寵至極。然而，這並沒能給曾國藩帶來多少快慰，相反，他卻有一種臨深履薄的驚心。在一首給其弟曾國荃的詩中，曾國藩道出了自己當時的境況和心態：

左列鐘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
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雲過太虛。
無獨有偶，二十年之後，他的兒子曾紀澤在萬里之外的英倫，也寫下了意象相似的詩文：

不可瀟留是歲華，鬢毛斑白向天涯。
深知戀棧空餘豆，願欲安爐去煉砂。
故國音書多悵惱，中年詩集半傷嗟。
低頭一拜陶彭澤，萬事乘除問酒家。

詩中提到的屠羊說和陶彭澤是什麼樣的人？有著怎樣的嘉言懿行，竟令聲名顯赫的曾氏父子也對他們頂禮膜拜呢？屠羊說是《莊子》中的一個人物，故事是說春秋時楚昭王喪失了王位，屠羊說跟隨昭王逃難。後來，昭王回國又奪得了王位，要賞賜跟隨他一起逃亡的人，包括屠羊說。屠羊說卻說：「大王丟失了王位，我失去了屠羊的職業；現在，大王恢復了王位，我也恢復了從前的職業。既然我的俸祿已經恢復了，又何必再行賞賜呢？」

昭王執意要獎賞他，屠羊說說：「大王失國，不是我的罪過，我不能接受懲罰；大王復國，也不是我的功勞，所以我也不能接受賞賜。」昭王打算接見屠羊說，屠羊說又說：「根據楚國的法令，只有建立大功的人才能親見國王，而我的智謀不足以保存國家、勇力不足以殺死敵寇。吳軍進攻郢都的時候，我是畏懼艱難而逃避，不是一定要追隨大王。現在大王要遵齊法令來接見我，普天之下，我沒有聽說過這種做法的。」

昭王覺得屠羊說雖然地位卑賤，然而「陳義甚高」，準備讓他擔任三公的職位。屠羊說說：「我知道這三公的職位比在集市上屠羊地位尊貴得多，所得的俸祿也優厚得多。然而，我怎能貪圖高官厚祿而使國王蒙受妄施的惡名呢！我不敢當，還是讓我回到集市上繼續從事屠羊的職業吧！」就這樣，屠羊說始終沒有接受昭王的賞賜。

作爲一個重義輕利的典範，屠羊說備受後人推崇，《新唐書》裡就記載了一個名叫李渤的人的事跡，展現了與屠羊說同樣的精神風貌：

李渤字溶之，魏橫野將軍、中書公發之裔。父鈞，殿中侍御

CARROLLTON BANK

卡羅頓銀行

since 1877

www.carrolltonbanking.com

EQUAL OPPORTUNITY LENDER Equal Opportunity Lender · Member FDIC

張雅惠

亞裔業務代表

Tina Hsieh · Vice President

314-655-3854

歡迎來電洽詢

傳真：314-863-5206

協助您處理支票帳戶、存款帳戶

商業及個人貸款等

週一至週五9am – 5pm在Clayton辦公室

可電話預約至其他辦公室

九個分行爲您提供方便的服務

免費停車

7911 Forsyth Blvd., Clayton, MO 63105 (corner of Central & Forsyth)